

# 民族社区妇女旅游精英角色 基于性别特质的演绎

褚玉杰, 赵振斌, 张丽

(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社区精英角色研究是社会分层研究的重要内容,随着民族旅游的蓬勃发展,民族社区中诞生了妇女旅游精英,其角色对社区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旅游研究中却未获得足够关注。文章利用扎根理论方法,基于西部4个省8个民族地区的22位妇女旅游精英的访谈资料思考妇女旅游精英角色。研究表明,妇女旅游精英和普通社区精英皆为社区中的权威人物,其角色亦有积极与消极之分;但由于受到传统性别观念影响,妇女旅游精英多为非治理精英;同时,她们扮演民族“女性”艺术守护人和女性与弱者关怀者等具有女性特质的角色。

**[关键词]**妇女旅游精英;扎根理论;精英角色;旅游社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00-0000-0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6.00.000

## 引言

Pareto将社区精英定义为社区中那些具有特殊才能、在某一方面或某一活动领域具有杰出能力,并在权力、声望和财富等方面占有较大优势的社区成员<sup>[1]</sup>,这是西方精英理论的经典定义。国内部分学者给予社区精英更多关注,有学者将在小群体交往实践中,那些比社区其他成员能调动更多社会资源、获得更多权威性价值分配的人称为精英<sup>[2]</sup>;另有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西部民族社区旅游开发中妇女参与与精英化问题研究”(10YJA840061)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西部乡村旅游社区多义空间构成与互动机理研究”(41171126)共同资助。[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grants from the projec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Education Ministry of China (to ZHAO Zhenbin) (No. 10YJA840061) and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to ZHAO Zhenbin) (No. 41171126).]

**[收稿日期]**2015-03-12; **[修订日期]**2015-11-26

**[作者简介]**褚玉杰(1988-),女,河南南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区旅游影响, E-mail: dazihuaxiang163@163.com; 赵振斌(1965-),男,陕西洛南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和社区旅游, E-mail: zhaozhib@snnu.edu.cn, 通讯作者; 张丽(1989-),女,内蒙古包头人,硕士研究生。

学者强调,除了拥有更多资源和成功以外,社区精英还应为社区做出贡献,其个人权威能够对其他成员乃至社会结构产生影响<sup>[3]</sup>。精英群体处于社会分层的上层,是影响社区发展的关键人物,研究其产生原因、行为方式<sup>[4]</sup>、地位及角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sup>[5]</sup>。

## 1 文献综述

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sup>[6]</sup>。个体的角色往往由其在社会群体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精英在社会群体中处于核心位置,其角色历来受人瞩目。

中国乡村精英角色问题的缘起,最早见于Max Weber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讨论,他指出中国乡村地区具有自治性质,非正式官僚的“地方人士”在乡村地区实际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sup>[7]</sup>。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和吴晗就士绅在乡村政治中的身份与功能等问题进行探讨,进而在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及其运行方面产生争论<sup>[8]</sup>。随后的学者研究认为,中国乡村治理(体制/政治)精英角色包括乡村社区利益“保护人”<sup>[9]</sup>、国家利益“代理人”<sup>[10]</sup>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双重”身份3种<sup>[11]</sup>。此后,关于村落精英的社区角色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治理方面,社区精英(community elite)多被冠以管理者、决策者、组织者和国家与农民间的桥梁等角色<sup>[5]</sup>,显然这也是从治理精英角度进行的探讨。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乡村社区中的精英类型日益多样,其在社区中扮演的角色必然随之丰富。

### 1.1 社区旅游精英角色

无论是一般的农村社会学研究,还是类似社区参与式旅游发展(community participatory tourism development, CPTD)的专题研究中,“社区精英”概

念总能成为一个焦点<sup>[12]</sup>。根据掌握的社区资源和影响领域的不同,传统精英研究将社区精英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3类<sup>[3]</sup>。然而随着社区旅游的蓬勃发展,旅游社区诞生了新的社区能人,他们依靠自身的旅游发展走上富裕之路,成为社区内具有影响力的旅游精英<sup>[13]</sup>,但也不乏由传统类型精英流转而来的旅游精英<sup>[14]</sup>。旅游精英的成长不仅有赖于传统类型精英的优势资源,如个人能力、权力<sup>[15]</sup>、金钱、人际关系<sup>[16]</sup>等,而且依靠其他因素,如旅行者<sup>[17]</sup>、进取精神和个人美德<sup>[13]</sup>、文化承载<sup>[18]</sup>等。因此,社区旅游精英与传统社区精英既有相似之处,但又明显不同。

研究表明,旅游精英在旅游社区中扮演积极角色。社区旅游精英通常是民族旅游开发的呼吁者和设计者<sup>[19]</sup>,也是民族文化的保护者和民族文化认同的引导者<sup>[20]</sup>;他们是社区旅游的直接和主要服务者,在社区旅游、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sup>[17]</sup>;社区旅游精英中的个别精英还成为社区旅游的治理者,在社区管理和村民日常行为引导方面有着很大的发言权<sup>[21]</sup>,甚至形成了社区旅游的精英治理模式<sup>[22]</sup>。

同时,精英在普通社区中的消极角色已获得学术界和政策层面的广泛关注<sup>[23]</sup>,社区旅游精英的角色同样存在局限性。Brohman提到体制精英们倾向于利用旅游社区参与组织来谋取私利<sup>[24]</sup>,Tosun指出旅游社区中的精英常常以牺牲大众利益来为自己服务,而且,社区精英提供的高层次服务项目挤压了其他社区成员的经营项目<sup>[25]</sup>,部分治理精英在领导当地旅游开发过程中成为社区利益分配中的最大受益者<sup>[26]</sup>;同时,民族旅游社区中普遍存在着精英与民众之间的矛盾、精英与开发商之间的矛盾<sup>[27]</sup>。

然而,目前社区旅游精英研究总体处于起步阶段,且侧重旅游精英现象描述、个案成长及部分精英在社区中的治理作用;以社区旅游精英角色为主题的研究尚不多见,他们在旅游社区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清晰。而基于个案的影响或作用和局部描述研究难以窥其全貌,更无法为发挥精英在社区发展中的良好作用提供有效参考。

## 1.2 社区妇女旅游精英角色

由于受到传统性别观念影响,目前中国传统乡村社区女性无法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发展机遇,因此,乡村社区精英仍以男性为主<sup>[28]</sup>。然而,旅游业却给予女性更多成长为精英的机会<sup>[29]</sup>,特别是在西部

乡村的民族旅游社区内,旅游开发给当地女性带来新的发展途径,她们中的一部人利用超越其他普通社区成员的资源在旅游参与中获得成功,为社区发展做出贡献,并获得社区影响力,成为妇女旅游精英。

作为成长于民族旅游社区的新型精英,妇女旅游精英的角色具有特殊性。社区女性是民族社区旅游的参与主体<sup>[30]</sup>,妇女旅游精英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她们对于民族社区旅游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是社区旅游发展中的关键人物,但现有研究甚少关注其成长与角色。现实中,男性中心思想和体制根深蒂固,深刻影响着妇女的经验和发展<sup>[31]</sup>,而已有旅游精英研究中的无性别化分析显然无法解释旅游社区中女性成长的独特性,这就需要关注性别差异化表征的性别视角发挥作用。综上所述,本文从性别视角出发,基于多个典型民族旅游社区来探讨妇女旅游精英角色,对于女性自身成长、社区旅游和社区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 2 研究资料来源与方法

### 2.1 资料来源及处理

本文的22位妇女精英样本来自西部地区4个省份的8个典型民族旅游社区,包括青海省HZ县XZC(2011年7月),四川省L县TPQZ(2012年7月),贵州省贵阳市HX区ZSC(2013年1月),贵州省LS县QHMZ(2013年1月)和LP县XZDZ(2013年7月),广西省LS县PAZZ(2013年8月)和HLYZ及阳朔GT镇LC(2013年8月)。在这些社区中,民族旅游的蓬勃发展塑造了更为开放和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社区妇女旅游精英的付出,反过来又促进社区妇女旅游精英的成长,因此,作者将其作为本研究的样本选取地。

调查过程中,调研人员首先了解社区女性的旅游参与情况,随后由当地干部和多名社区成员依据“旅游参与获得成功、为社区做出贡献、拥有社区影响力”3个方面的要求初步推荐调查对象,随后调研人员对33位被推荐对象进行了深度访谈。

在资料整理过程中,研究者们再次综合“旅游参与获得成功、为社区做出贡献、拥有社区影响力”3个方面对33位受访对象进行衡量,剔除不符合条件的访谈对象,筛选确定用于研究的妇女旅游精英,共有22位符合我们关于妇女旅游精英的界定,精英编号及所属社区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TPQZ

表1 民族社区妇女旅游精英样本  
Tab.1 The samples of women tourism elites in ethnic communities

精英编号 Number	参与旅游方 式 Work in tourism	所属社区 Communit y	精英编号 Number	参与旅游方 式 Work in tourism	所属社区 Community
S1	刺绣制作 与销售	XZC	S12	避暑度假 养老公寓	ZSC
S2	食宿接待	XZC	S13	食宿接待	QHMZ
S3	食宿接待	XZC	S14	食宿接待	QHMZ
S4	食宿接待	XZC	S15	食宿接待	QHMZ
S5	食宿接待	TPQZ	S16	食宿接待	QHMZ
S6	食宿接待	TPQZ	S17	刺绣制作 与销售	QHMZ
S7	食宿接待	TPQZ	S18	民族歌舞 表演	ZXDZ
S8	刺绣制作 与销售	TPQZ	S19	民族歌舞 表演	ZXDZ
S9	刺绣制作 与销售	TPQZ	S20	食宿接待	PAZZ
S10	民居参观、 食宿接待	TPQZ	S21	民族歌舞 表演	HLYZ
S11	食宿接待	TPQZ	S22	食宿接待	LC

的S10作为一位典型的妇女旅游精英,我们未能与其本人见面,但是调查人员见到了一直与S10结伴从事旅游接待的妹妹Z1,因此,关于S10的访谈内容以《TPQZ记事》视频中对S10的访谈作为基础,并以Z1的口述作为佐证。

### 2.2 研究方法

半结构访谈法。访谈主要围绕以下主题进行,包括:个人成长经历和旅游参与历程;个人特质与家庭背景;个人与社区成员、社区旅游发展、社区整体发展的关系。在获得受访者同意后对访谈内容进行全程录音,以尽可能完整表述为基础,对访谈时间不作具体要求,随后将录音内容整理为word文档作为研究资料。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扎根理论最早于1967年由社会学家Glaser和Strauss提出<sup>[32]</sup>,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归纳研究范式<sup>[33]</sup>。扎根理论是一种自下而上建立实质理论(substantive theory)的方法,在研究开始之前研究者一般没有理论假设<sup>[34]</sup>,它要求研究者进入被研究群体的日常生活收集资料、从资料中生成概念、类属、假说、理论,如此一来,理论就能超越个人无根据的想象,根植于被研究群体的意义世界,从而忠实地再现社会实在<sup>[35]</sup>,因此,扎根理论一定程度上脱离了量化的和标准的实证研究的程序化“捆绑”,信息更加全面真实。由于社会分工

与传统性别角色构建等原因,女性社会和家庭地位偏低,她们的处境多与一些非正式的、非意识到的、隐约的内容有关,这并不是实证研究所擅长的<sup>[36]</sup>,因此,就需要在女性研究领域具有特殊价值的扎根理论发挥作用<sup>[18]</sup>。考虑到传统乡村社区中有限的妇女精英及其研究、已有旅游研究中性别关注不足和对妇女旅游精英及其角色的忽视,作者采用了扎根理论方法。

### 3 民族社区妇女旅游精英角色的扎根理论分析

Strauss将扎根理论对资料的分析称为译码,指将所收集的文字资料加以分解、赋予概念,再以适当方式将概念重新抽象、提升和综合为范畴以及核心范畴的操作化过程,包括3个级别的译码<sup>[37]</sup>。

#### 3.1 开放性译码

开放性译码是指将资料分解、检视、比较、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将资料打散,赋予概念,然后再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的操作化过程<sup>[37]</sup>。本研究对民族社区妇女旅游精英的访谈资料进行了开放性译码,译码过程见表2(部分)。

开放性译码中的概念与范畴的名称来自多个途径,其一为受访者的表述,其二为已有研究文献描述,其三为作者的总结概括,即这些概念和范畴名称的产生依据是受访者的鲜活描述、研究者的视角与其他研究观点之间的开放而持续的互动。通过对民族社区妇女旅游精英访谈资料的开放性译码分析,作者共提取出79个概念。随后根据概念本身属性及概念意义,将相关概念初步归并为25个范畴。然而,由开放性译码分析得出的25个范畴间意义较为分散,相互间关系并无明显联系,需要进行进一步比较探讨才能为理论构建服务;且民族建筑保护(A8)和民族习俗传承(A9)两个范畴所基于的概念不够充分,不足以支撑其进行进一步的译码分析,因此将其剔除,最终得到的23个范畴(见表3)。

#### 3.2 主轴译码

主轴译码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范畴之间的联系,以表现资料中各部分相互之间的关联<sup>[38]</sup>。开放性译码分析中得到的23个范畴的意义范围宽泛,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清晰。因此,作者回归访谈资料,在不同受访者的资料中反复比较和思考访谈内容、概念和范畴所代表的意义,从而探讨范



表 2 访谈资料的开放性译码(部分)

Tab.2 The opening coding of interview data (partly)

开放性译码 Open coding		访谈资料(部分) Interview data(partly)
范畴化 Categorization	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A1 社区旅游带头人(a1-a3) A1 The foregoer of community tourism(a1-a3)	a1 寻求社区旅游出路 a2 开拓社区旅游市场 a3 组织村民接待游客	我和 Z2 跑到 HZ 县城和 XN, 我们边卖刺绣品边打听 QH 别的地方搞旅游的事, 我们问他们哪里的外国客人多, 他们说是 TES 和 QH 湖最多, 我们就搭车去了 TES。(a1) 后来我和 Z2 又去了兰州, 这些都是我们自费去的, 接着我们几个又去了西安、北京、上海、四川、云南、广西等地, 我们就这样背着宣传册和自己做的刺绣到处跑着做宣传。(a2) 当时散客不接, 都是接外地团和外国团, 以前接待都接别人院子, 有时六七家的同时接待, 一个外地团 80-100 元/人, 一个外国团 120 元/人, 我们几个组织村上的人接了几年团队。(a3)
.....	.....	.....
A5 民族刺绣传承人(a14-a16) A5 The inheritor of ethnic embroidery(a14-a16)	a14 民族刺绣继承人认定 a15 民族刺绣创新 a16 民族刺绣市场化	这是我 2009 年被评为“致富女能手”的奖, 还有这个, 是 2010 的, “传统美术(T 族 P 绣)代表性继承人(QH 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a14) 我从小就喜欢 Q 绣, 就琢磨配色方案自习绣来自己摆弄着玩。我现在也主要是做 Q 绣……现在是最原始的方案, 找一些学设计的美术的大学生, 对民族元素有一点了解的, 让他们来做设计构图, 结合民族元素和市场的时尚做一些包包啊这些, 主要在 Q 绣馆卖, 也有订。(a15) 政府现在要把 Q 绣馆做大做一个很好地展示平台, 政府也很支持的, 政府会投一笔钱装修我那个 Q 绣馆, 作为一个展示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基地。(a16)
.....	.....	.....
A13 女性关怀者(a41-a42) A13 Female caregiver(a41-a42)	a41 带动女性就业 a42 帮助女性成长	我这个是带动全乡 5 个村的女性, 实实在在的, 没有浮夸虚报的, 带动 5 个村 480 多个绣女……我这个 Q 绣具有带动性鼓励性, 再就业, 给他们找个门路。(a41) 村子的小媳妇不太会跳, 我就联系我娘家那边的像 N 老师、D 老师啊, 他们本身是我的 T 语老师, 让他们过来教, 她们(小媳妇)也学的很好。(a42)
.....	.....	.....
A18 高层次接待设施拥有者(a53-a54) A18 The owner of high-level tourism reception facilities(a53-a54)	a53 完备团队接待条件 a54 高档次接待设施	本来村子里有十几户接待团队的, 现在就剩我和 Z2, 因为接待团队牵涉到雇人太多, 找阿姑跳舞唱歌啊, 团队要跳舞吃饭的, 有点麻烦, 都接待不了了, 团队里面人太多, 需要我们表演、展示民风民俗, 各种要求都要尽量满足, 整体档次比较高, 做起来挺难得。(a53) 像我们这里观景又好, 看得到全寨的风景, 房间里卫生条件比较好, 还有冷暖气, 数字电视, 网络, 那时候装的时候我们就想装的好一点。我的住宿条件已经算是马马虎虎在 XJ 头等的了, 旺季的时候我们全部靠订房, 像我们这样的条件在 XJ 不算很多。(a54)
.....	.....	.....
共计 25 个范畴 Totally 25 categories	共计 79 个概念	

注: 由于访谈资料的开放性译码涉及概念和范畴较多, 此处仅截取了部分内容。

表 3 主轴译码后的主要范畴

Tab.3 The major categories after axial coding

主范畴 Main categories	范畴 Categories	主范畴 Main categories	范畴 Categories
AA1 社区旅游引领者 AA1 The leader of community tourism	A1 社区旅游先行者; A2 社区旅游名片; A3 社区旅游宣传; A4 共享旅游经营经验与客源	AA5 社区和谐促进者 AA5 The promoter of community harmony	A16 促进社区内外成员就业; A17 基础设施改善
AA2 民族“女性”文化守护人 AA2 The guardian of ethnic “female” culture	A5 民族刺绣传承; A6 民族歌舞传承; A7 民族饮食传承;	AA6 社区客流主导者 AA6 The dominant player of community tourists	A18 高层次接待设施; A19 旅游经营能力强; A20 稳定客流
AA3 社区旅游“管理者” AA3 The “administrator” of community tourism	A10 社区旅游发展建言; A11 社区旅游集体组织成员; A12 社区管理层	AA7 政治关系受益人 AA7 The beneficiary of political relationships	A21 牢固政治关系网络; A22 享受政府优惠政策与机会;
AA4 女性与弱者关怀者 AA4 The caregiver of female and the weak	A13 女性关怀; A14 弱势群体关怀; A15 关怀老人儿童;	AA8 非自觉矛盾引发者 AA8 The non-consciousness causer of contradiction	A23 经营观念差异明显; A24 社区成员关系消极; A25 社区成员矛盾激化

瞬间的关联,最终从23个范畴中提取出8个主范畴(见表3)。

### 3.2.1 社区旅游引领者

在民族社区的旅游发展过程中,部分女性成为社区旅游开发的先锋,她们组织社区成员积极参与旅游,发家致富,拥有较高知名度;也有部分女性在自身发展势头良好的基础上,帮助其他社区成员,关注社区整体旅游发展,最终凭借个人能力、个人知名度和大局意识成长为社区旅游的引领者。在22位妇女旅游精英中有12位扮演该角色。

社区旅游先行者。在22位民族社区妇女旅游精英中,有5位较早意识到社区旅游开展的良好机遇,认识到旅游能够给社区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便组织社区成员开展社区旅游接待活动,将所在社区带上旅游发展道路,她们是社区旅游的先行者。如S10在自己中专毕业之后回到家乡,看到了本社区的旅游经济价值,并致力于带领社区成员招揽游客,为社区做宣传,随后又参加到政府的旅游开发中,成为社区旅游发展中的关键人物。

社区旅游名片,参与社区旅游宣传。在社区旅游的发展历程中,有6位妇女旅游精英凭借自身的特殊才能和在社区旅游中的出色表现,不断结识游客、企业和政府人员、记者、学者等,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她们在社区旅游宣传营销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当地社区旅游的代表性人物,被社区成员称为“社区旅游名片”。如S22的事迹在外国游客中广泛传播,获得领导接见,并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成为社区旅游名片,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社区,她已经同所在社区旅游形象融为一体。

分享旅游经营经验、技术和客源。22位妇女旅游精英中,有10位提到会跟社区其他参与旅游成员交流旅游经营的成功经验,如传授接待设施购买经验,分享服务技巧,或在客源充裕的情况下,将客人推荐给社区其他成员,促进社区整体旅游参与水平和接待规模的提升。如S7说到:“我们自己觉得需要出去看看学习一下,我学到的东西还要传授给其他人,我不怕他们影响我生意,要让更多的人做,这个旅游要做好,你不要只看到眼前的这一点,你要让大家都有同一种想法同一种做法,那样才好,大家都做好客人就多了。”

### 3.2.2 民族“女性”文化守护人

民族社区中的妇女旅游精英多为本民族成员,她们认识到本民族特色文化对于民族和社区旅游发展的独特价值,特别是女性相对热爱和擅长的民

族文化,比如刺绣、歌舞、特色餐饮等。目前妇女旅游精英比社区男性更专注地投身于这些文化的传承中,不仅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并从中获得个人成长与满足,最终成为这些民族“女性”文化的守护人,她们的这一角色有利于社区旅游民族特性的保持。在我们访谈的22位妇女旅游精英中,有12位认识到民族“女性”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以下分为民族刺绣、歌舞和饮食3个方面来阐述。

民族刺绣传承。作为民族特色技艺的一种,民族刺绣的传承中尤以社区女性最为出色,她们对于色彩和花样拥有与生俱来的敏感。8位妇女旅游精英强调民族刺绣的重要性,其中有4位不仅热爱民族刺绣,且拥有精湛技艺,并在刺绣的传承和保护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如S1在T族博物馆内制作并销售T族刺绣艺术品,并获得“致富女能手”和“传统美术(T族盘绣)代表性继承人”荣誉称号,成为宣传和展示T族刺绣工艺的典型代表人物。

民族歌舞传承。民族特色歌舞是民族旅游社区独特的文化艺术和重要吸引物之一。而在民族歌舞传承中,民族女性的角色尤为重要,她们不仅能歌善舞,还用智慧和辛勤来推动民族特色歌舞的传承与保护,往往成为民族歌舞传承中的靓丽风景。22位妇女旅游精英中7位妇女旅游精英意识到歌舞作为民族特色的重要价值,而其中有4位以民族歌舞的传承与保护为己任。如S3提到:“当年一起表演民族歌舞的小伙子们都成家娶媳妇了,大部分去搞别的副业挣钱了,除了从一开始搞的Z2以外,其他的基本不再参与这些了,大家觉得唱歌跳舞都是女人们的事,男人搞这个有点不务正业的意思。”可见,社区女性才是民族歌舞传承的主力。再如S18自幼热爱D族歌舞,自己和朋友组织成立起D歌队伍,聘请专业老师,召集社区内的年轻人和老年人学习D歌,注重歌曲创新,这对于D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D歌的可持续发展。

民族饮食传承。厨房在民族女性的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她们对于民族特色饮食十分熟悉;作为社区旅游接待中的吸引要素之一,妇女旅游精英十分关注民族特色饮食,并在生活和接待中不断推进民族饮食的传承。民族饮食的传承成为7位妇女旅游精英的共识,她们认为这些特色饮食是民族的宝贵文化,不能丢失。如S3和S5意识到只有“原原本本”的、民族的饮食最吸引游客,而S10则在旅游接待中不断还原民族特色菜品,并不断创新推广新的特色民族菜。

### 3.2.3 社区旅游“管理者”

在传统乡村社区中,女性的地位较低,生活被局限在家庭领域,无法在社区管理中获得话语权,然而,在旅游发展中获得个人成功的妇女旅游精英却得到了家庭和社区的认可,拥有了一定的发言权。伴随着成功而来的是开阔的视野和新的观念,9位妇女旅游精英意识到自我成功同社区密不可分,但社区旅游发展并非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因此,她们开始关注社区旅游的整体发展,并向政府机构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或加入社区旅游集体组织甚至进入社区管理层,肩负起自身对社区旅游管理和发展的责任,成为社区旅游“管理者”。

为社区旅游发展建言。虽然意识到社区旅游发展存在问题的人很多,但并非每个社区成员都会向政府机构提出自己的看法与建议,有6位妇女旅游精英表示自己曾这样做。即使这些看法和建议未必能够转化为现实管理,但表达社区居民切身利益需求,本身就是为社区旅游管理出谋划策。如S6提到自己跟村长提意见,希望能给社区里没有参与到旅游业中的人提供工作机会,既能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还能促进社区治安的维护。

社区旅游集体组织成员。民族旅游社区通过成立社区集体组织来监督和管理社区旅游发展事务,促进社区旅游活动的顺利开展,一些妇女旅游精英积极参与其中,充分显示了她们对社区旅游发展的热情和高度关注。在22位妇女旅游精英中,有3位女性精英成为社区旅游集体组织成员。如S8讲到:“2009年我是TP乡Q绣协会的会长,党委政府让我担任会长,是民间团体,不能经商不能盈利,然后转为公司化的运作,成立一个L县TPEMQ绣开发有限公司,得到了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的支持。”

成为社区管理层。尽管乡村女性地位有所提高,但社区中较高的社会职位仍主要由男性担任<sup>[28]</sup>。而在民族旅游社区中,部分妇女旅游精英由于旅游成功不仅获得社区成员的认可,同时也获得了进入社区管理层的机遇。基于旅游社区的特殊性,其社区管理者必然肩负旅游管理职责,因此,走上社区管理层的2位妇女旅游精英,得以将自己高水平的旅游经营能力和进步理念融入工作,进而促进社区旅游的规范发展。如S4是XZC最早参与旅游的成员之一,并凭借积累的人气成为村会计兼妇女主任,她说:“我是希望我们这个村子里都最好自己经营农家院子,你看现在,有的院子转租出去后,我们本民族的很多优秀文化、风俗保留的不如从前他们

(承租户)已经把这个旅游接待纯粹的理解为搞餐饮了,完全丢失了我们XZC搞旅游接待的本质。”

### 3.2.4 女性与弱者关怀者

关怀伦理学代表学者卡罗尔·吉利根指出,男性把自我看成是独立的自主的存在,把道德视为个人权利的排列,奉行一种强调准则和权利的公正伦理;而女性则倾向把自我看成一种相互关系中的存在,把道德视为对他人的责任,奉行一种重视关系和责任的关怀伦理<sup>[39]</sup>。可见,相较于男性,女性更注重对他者的关怀,在本研究中,有8位妇女旅游精英在自己的旅游经营活动中给予女性与弱者较多帮助。

女性关怀。妇女旅游精英在取得个人成功之后,对于同样身为女性的社区内外其他女性有着特殊关注,她们乐于为其提供帮助,有6位妇女旅游精英提到自己在带动女性发展中所做出的努力。如S8讲到自己的Q绣工坊带动了全乡5个村480多个女性就业,而且会对其进行Q绣技能培训。

弱势群体关怀。通常情况下,感性而又充满同情心的女性更容易被弱势群体的境况所打动,并施以援手,有3位妇女旅游精英讲到自己曾为弱势群体提供必要帮助。如S9提到:“以前妇联的培训都是我以免费性的形式培训,不止TPQZ的人,只要想学都可以,免费性的培训,你那个(指S9家)也是妇女就业帮扶中心,其实我以后Q绣馆也是作为整个L县妇女的再就业(基地),残疾人的再就业,有地震中瘫痪的,小儿麻痹的,他们有些手工特别好。”

关怀老人儿童。照顾老人和儿童是传统家庭分工赋予女性的职责,更是她们生活的一部分,而在她们走向成功之后,一如既往地把关怀社区老人和儿童看作自己的责任。有3位妇女旅游精英为社区中的老人与儿童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如Z1说到:“和姐姐(S10)合办的幼儿园作为一种公益事业,姐姐出资我出力,我们这的孩子很少,去年最多,加上我的女儿一共十二个孩子,我们还要倒贴,就是寨子和附近的一些孩子,我们还要请两个老师和一个厨子,我们不图孩子上面有任何回报,只是做一个公益事业。”

### 3.2.5 社区和谐发展促进者

在成为社区新型精英之后,妇女旅游精英利用自身能力为社区成员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并在雇佣期间对其进行培训,促进就业人员个人能力的提升。同时她们关注到社区在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积极提供解决方案,进而成为社区和谐发



展促进者,22位妇女旅游精英中有7位扮演该角色。

促进社区内外成员就业。在22个妇女旅游精英中有7位女性精英提到为社区内外成员提供就业和增收机会,并对其进行培训提升促进其个人成长。如S13提到:“我们解决的就业人员也多,有46到50个员工,正式签约的有32人,都是附近村和这个村……给员工开会培训,这个冬天,别的家都放假了我们不放假,我们不放假的原因是我们有很多事情做,需要看菜谱里需要整改的地方,工作的时间我们把需要改进的地方来沟通来讨论,就像上课一样,我就不断地学习,让大家也不断地学。”

基础设施改善。传统乡村社区精英中的女性成为斗争的牺牲品是经常的事情,这不仅仅是对女性精英名誉、道德的损伤,也为女性精英的发展道路设置了障碍,使女性精英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望而却步<sup>[39]</sup>。而相较普通乡村社区,民族旅游社区更为开放,其成员对传统性别角色标准有了较新的认识,对妇女旅游精英的态度更为包容,使得她们开始涉足社区公共事务。有2位妇女旅游精英提到自己为改善社区基础设施出过力。如S12说:“特别是我们的电今年不够,洗澡都洗不上,他们就着急就跟我去找关系,去找区长啦记者啦,村里人怕得罪电管所啊,村长都不去,我去的,后来安了一个变压器,本来说十二月份保证通电,结果11月25号就接进来电了,我就去感谢他们,我就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区长。”

### 3.2.6 社区客流主导者

同其他社区旅游参与成员相比,有16位妇女旅游精英资金雄厚,拥有较大规模、高档次的旅游产品及服务,加之旅游经营能力较强,受到更多游客的青睐;她们能够主导社区客源的流向,致使其他社区成员的旅游经营不可避免地受到挤压。

高档次接待设施。在22名妇女旅游精英中,除民族刺绣和歌舞为主要经营业务的7名精英外,有14位妇女旅游精英(除S4外)具备超过普通社区成员的接待设施,使得她们获得了高层次游客的认可。如S15说:“像我们这里观景又好,看得到全寨的风景,房间里卫生条件比较好,还有冷暖气,数字电视,网络,那时候装的时候我们就想装的好一点。我的住宿条件已经算是马马虎虎在XZ头等的了,旺季的时候我们全部靠订房,像我们这样的条件在XZ不算很多。”

旅游经营能力强。除了拥有高档次接待设施以外,有11位妇女旅游精英拥有较强的经营能力,

服务意识强,不仅在服务过程中注重同游客的沟通,并认识到维护客户关系的重要性,努力保证游客的完美体验,进而在社区旅游接待中处于有利位置。如S16认为气氛是服务行业必须要重视的,环境和服务也要好,无论客人多少,每天都会在接待中穿插节目表演,可见她有着较强的旅游经营能力。

稳定客流。妇女旅游精英除了依靠高品质服务留住口碑客流以外,还拥有独特的客源渠道,22位妇女旅游精英的13位拥有较为稳定的客源。如S3提到:“基本上我的顾客是稳定的,跟我联系的司机、导游都是比较固定的,跟他们的合作比较多,彼此间的信任也加强。”

### 3.2.7 政治关系受益人

在自身的旅游经营发展过程中,妇女旅游精英善于处理政治关系,从而积累了大量的政治关系资源,通常政府被树立为优秀典型,并获得本应由社区共享的政府支持,如成为定点接待处,获得政府资金、人力或政策优惠等,这对于她们的旅游经营十分有利。但客观上,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对其他社区旅游参与者产生了负面影响。在本文的22位妇女旅游精英中有9位是政治关系受益人。

牢固政治关系网络。在民族社区旅游接待中,与村、乡、县甚至更高级别政府人员的关系对于妇女旅游精英的旅游经营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她们十分注重维护政治关系。其中有9位妇女旅游精英谈到自己良好的政治关系网络,如S7提到:“旅游局上面列的三家就有我们家,是第一个……我家就成了政府的定点接待,因为地震的时候没有人搞餐饮住宿,我接待了很多领导很多客人,政府也晓得……”

政府优惠政策与机会。同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不仅意味着直接的经济效益,同时会带来更多的机遇、政策支持等,有8位妇女旅游精英的访谈内容涉及此方面。如S13谈到:“省里的乡土人才培养啊去了六天,学到不少东西,都是乡土人才互相交流,又去北京农家岭学校学习了10天,是团委推荐我去的,是个很好的机会。”

### 3.2.8 非自觉矛盾引发者

伴随妇女旅游精英经营成功产生的是丰厚的旅游收益和更加超前的经营理念,这一方面使得她们获得成功和影响力,进而成为社区旅游精英;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她们与普通社区成员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进而在某些方面脱离普通成员,从而导致社区矛盾的出现。然而这种矛盾并非由于妇女旅游精英自身主观造成,因此称之为非自觉矛盾引

发者,在 22 位妇女旅游精英中有 5 位扮演该角色。

经营观念差异。有 3 位妇女旅游精英不认同社区其他成员的旅游经营方式,并因此同社区成员产生差距;她们的经营理念本身或许是合理的,但是随着经营观念差异的不断扩大,也使得她们与社区其他成员的矛盾不断增加。如 S3 讲到:“作为农民的我们,意识淡薄,也学他们的(指村外大型民族风情园的粗略风情表演、巧立名目要小费等行为),忽视我们自己的东西,纯粹挣钱,只能随大流。作为个人的我其实去年就觉得这样不对,应该保持原貌,我们村里像有这方面的想法的人不多,我跟她们聊这,她们都觉得目前这样挺好的,说什么,反正我家现在有客人,能挣钱就行。现在这个品牌慢慢的都砸了,再翻身就很难了。”

社区成员关系消极。妇女旅游精英在获得旅游经营成功之后,虽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有 4 位认为她们同普通社区成员原本融洽的关系变为微妙而冷漠的消极关系。如 Z1(S10)提到发展旅游之后,社区成员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人变得自私,相互之间开始防范,觉得很无奈,这种某种程度上可称为“矛盾”的关系在多个社区均有出现,成为妇女旅游精英和普通社区参与成员间不可避免的消极关系。

社区成员矛盾激化。当社区旅游竞争越加激烈的时候,妇女旅游精英持续膨胀的良好效益必然导致社区贫富差距加大,致使其他社区成员心理不平衡,随之而来的便是精英与其他社区成员间不断激化的矛盾。这一方面是社区管理机制不健全所导致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社区精英在利用社区共享资源获得成功的基础上,没有为社区整体发展做出相应贡献所致。然而,这种矛盾激化的现象同社区本身的发展阶段也存在较大关系,往往是在社区旅游开始走向衰退的时段凸显出来。有 2 位妇女旅游精英的访谈提及相关内容,如 S22 讲到:“好多游客看电视看到‘\*\*\*\*’(S22 的著名别称)来我这里,很多马来西亚泰国的都来我这里吃饭,冲着我来,我认识瑞典的,德国的,法国的,以色列的,有的人说全部都是‘\*\*\*\*’农家饭,我说你们搞错了,我‘\*\*\*\*’只是一家,那不是有名字吗……有的说我是‘\*\*\*\*’的儿子,那天有人找‘\*\*\*\*’农家饭,‘\*\*\*\*’早都不开了,嫉妒啊,害我。”

### 3.3 选择性译码

选择性译码是指选择核心范畴,将其系统地和

其他范畴予以联系,验证其间的关系,并把概念化尚未发展完备的范畴补充完整的过程<sup>[37]</sup>。通过对主轴译码阶段获得的 8 个主范畴的继续考察,同时结合原始资料记录进行互动比较、提问,作者发现可以用收获利益、做出贡献的具有女性特质的社区权威影响者(包括积极和消极影响)这一核心范畴来分析其他所有范畴。

妇女旅游精英在社区中扮演的角色充分体现了这一核心范畴的内涵,围绕该核心范畴的故事线可概括为:虽然妇女旅游精英在社区中扮演多种角色,并成为旅游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但仍受到传统性别观念约束,因此多以非治理精英身份发挥作用;妇女旅游精英角色同其自身的女性特质密切相关,在民族文化遗产和女性与弱者关怀中扮演特殊角色。

## 4 讨论与结论

### 4.1 讨论

本研究聚焦妇女旅游精英角色,丰富以往以男性精英为主的治理精英研究;以多个民族旅游社区为研究区域,突破以往以个案为基础的旅游社区精英研究;加之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并整合相关精英理论,有利于获得更贴近社会实在和更具外推力的解释。已有研究表明,乡村社区精英以男性居多<sup>[28]</sup>。然而,在旅游开发和社区开放的背景下,民族旅游社区已不同于传统以农业为主要发展方式的相对封闭的乡村社区,当地女性也获得了普通社区女性所没有的新机遇。其中部分民族社区女性率先抓住机遇,利用自身优势在社区中旅游经营中获得成功,并为社区做出贡献,获得社区影响力,最终成长为妇女旅游精英。鉴于女性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和精英在社区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探讨新型社区精英——妇女旅游精英的角色具有特殊意义。

中国普通社区精英往往在社区中扮演先锋模范角色,同时扮演经济利益垄断者和政治操控者的角色<sup>[5,11]</sup>。旅游研究者指出,旅游社区精英以其高层次服务挤压其他社区成员的旅游经营<sup>[20]</sup>,他们常常以牺牲大众的利益来为自己服务,并掌控社区和社区所依赖的资源<sup>[25]</sup>,进而成为社区旅游最大的利益获得者<sup>[14]</sup>。本研究中,妇女旅游精英是社区旅游的引领者,与普通社区精英同样扮演先锋模范角色,但主要体现在旅游经营实践中;拥有良好设施和较强经营能力的她们是社区客流主导者,同普通社区



精英和旅游社区精英一样成为利益获得者;虽然她们获得本应由社区共享的政治关系资源,是社区政治关系受益人,但却远未达到政治操控者的程度。

获得个人成功后,妇女旅游精英渴望得到社区成员的尊重与认可,因此她们乐于扮演社区贡献提供人的角色,包括通过为社区旅游发展建言献策,或加入社区旅游集体组织甚至社区管理层来成为社区旅游“管理者”;同时她们促进社区内外成员就业和个人成长,并力所能及地改善社区公共设施,是社区和谐发展的促进者。传统乡村精英研究中对于治理精英的关注,使得社区管理者成为精英角色的重要内容。已有研究认为普通社区女性精英对既有社会分工的认可与无意识服从,导致她们对政治缺乏参与意识,态度冷漠,对公共事务望而却步<sup>[40]</sup>。虽然真正成为社区管理者的妇女旅游精英有限,但她们开始在社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对于社区旅游公共事务的关注和热情已经标志着改变的开始。旅游产业及旅游社区的丰富与开放性为妇女旅游精英从家庭领域步入社区公共领域提供条件,使得她们自身及社区成员的传统性别观念有所突破,从而对社区政治表现出兴趣。

伴随着利益的获得和贡献的增加,妇女旅游精英在社区成员中获得更高权威,其行为与思想依靠权威对社区成员和社区发展产生影响,她们扮演社区权威影响者角色。研究表明,女性精英在一般乡村社区的传统文化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sup>[23]</sup>,在民族文化保护中的更具特殊作用<sup>[27]</sup>。在本研究中,妇女旅游精英热衷民族文化中偏女性化的刺绣、歌舞、餐饮文化,不仅积极投身它们的保护与传承,并推动实际传承和保护活动的开展;同时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在社区内外传播民族“女性”文化保护理念,从而成为守护民族文化的中坚力量。在普通乡村社区中,男性精英的社区积极角色主要体现在稳定维护者、社会整合者、先锋模范<sup>[41-42]</sup>等彰显男性野心的强硬角色,而妇女旅游精英则以其仁慈与柔和心性给予社区内外女性和弱势群体(包括老人、儿童、残疾人等)更多帮助,扮演着女性与弱者关怀者的温情角色,这对于社区公平与信任的构建有着特殊作用。

基于精英在资源分配和利益争夺中的优势,社区中普遍存在着精英与普通成员间的矛盾<sup>[43]</sup>,旅游社区中亦是如此<sup>[24,27]</sup>。在本文中,丰厚的收益和增长的贡献不仅给妇女旅游精英带来了权威,而且带来了自身更强大的自信和社区成员的嫉妒,加之旅

游经营和文化遗产理念的差异,使得她们与普通社区成员之间的差距趋于扩大,从而导致社区隔阂与矛盾的出现,但这并非她们所期待的,因此称之为非自觉矛盾引发者。这种角色的改变,不仅需要妇女旅游精英为社区做出更多贡献,还需要她们发挥政府与社区中间人和协调人的角色,更亟待构建精英与普通社区成员之间的沟通与互助渠道。

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男孩和女孩在成长为男人和女人的过程中,不断地接受各方面的教导,而发展形成的相应的性别特质<sup>[44-45]</sup>。其中,女性被定义在私人领域,且被认为是温柔、慈爱、富有同情心的存在<sup>[37]</sup>,肩负着家庭内部的养育与照料职责<sup>[46]</sup>,这些性别特质深刻地影响着现实中的社会性别分工与角色。本研究中,妇女旅游精英演绎的社区旅游引领者和社区旅游“管理者”角色表明其对传统女性社会角色有所突破,然而,固有的性别特质和妇女角色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妇女精英的角色扮演,妇女旅游精英所扮演的民族“女性”文化守护人与女性与弱者关怀者的角色对社区旅游与社区本身的和谐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又体现了女性性别特质对其角色扮演的独特影响。这构成了旅游社区妇女精英角色的独特之处。

#### 4.2 结论

作为民族旅游社区中的新型精英,妇女旅游精英集多种角色于一身,她们在社区中既扮演社区旅游引领者、社区旅游“管理者”和社区和谐促进者等积极角色,也扮演社区客流主导者、政治关系受益人和非自觉矛盾引发者等消极角色。

虽然妇女旅游精英是政治关系受益人、社区和谐促进者和社区旅游“管理者”,她们关注公共事务和社区政治,但她们仍然受到传统观念对于女性社会分工定位的影响,多为非治理精英,远未达到社区政治操控者的程度。

同时,妇女旅游精英在社区中扮演具有女性特质的独特角色,依靠自己对于民族“女性”文化的特殊理解和无限热情,成为民族“女性”文化守护人,是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力量;而且她们利用自身所拥有的实力和影响力,将仁慈与温情播撒,为社区内外的女性和弱势群体提供帮助,成为女性与弱者关怀者。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Pareto V. *The Rise and Fall of Elites*[M]. Liu Beicheng, trans.

-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03: 178. [Pareto V. 精英的兴衰[M]. 刘北成,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178.]
- [2] Tong Zhihui. Elite mobilization in process of villagers' electoral participations[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02, (1): 1-9. [全志辉. 农民选举参与中的精英动员[J]. 社会学研究, 2002, (1): 1-9.]
- [3] Lu Xueyi. *Endogenic Village*[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1: 270-271. [陆学艺. 内发的村庄[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270-271.]
- [4] He Xuefeng. Village elite and community memory: Understanding the two-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village nature [J].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00. (4): 43-40. [贺雪峰. 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 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J]. 社会科学辑刊, 2000, (4): 34-40.]
- [5] Yang Shanhua. Lineage politics and the selection and role orientation of rural political elites and elites changes: A analysis framework[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00, (3): 101-108. [杨善华. 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 一个分析框架[J]. 社会学研究, 2000, (3): 101-108.]
- [6] Zheng Hangsheng. *The New Edition of Sociological Generality* [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9: 140.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140.]
- [7] Sun Xiulin. The era conversion of elites' role orientation in rural China[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Weekly*, 2010-5-25(11). [孙秀林. 中国乡村精英角色定位的时代转换[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05-25(11).]
- [8] Fei Xiaotong, Wu Han. *Imperial Power and Gentry's Power* [M]. Changsha: Yuelu Press, 2012: 106-114. [费孝通, 吴晗. 皇权与绅权[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2: 106-114.]
- [9] Xu Yong. Dual role of rural cadres: Agent and manager[J].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K)*, 1997, (8): 151-158. [徐勇. 村干部的双重角色: 代理人与当家人[J]. 二十一世纪(香港), 1997, (8): 151-158.]
- [10] Wu Yi. The Dual marginalization: A typologic analysis of the part played by and the behavior of village officials[J]. *Management World*, 2002, 11(1): 78-85. [吴毅. 双重边缘化: 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类型学分析[J]. 管理世界, 2002, 11(1): 78-85.]
- [11] Duara P.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M]. Wang Fuming, trans.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ress, 1996: 36.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 王福明,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 36.]
- [12] Zhang Xiaoming.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political elite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rural community tourism: A case of x village in the Southern Anhui[J]. *China Rural Survey*, 2006, (1): 30-38. [张晓明. 体制精英的个人经验及其对农村社区旅游的影响——皖南X村案例[J]. 中国农村观察, 2006, (1): 30-38.]
- [13] Wu Qifu. From a common villager to community elite: A typical case of China's tourism elite: Taking "Mamamoon" in Yangshuo as a case[J]. *Tourism Tribune*, 2007, 22(7): 87-90. [吴其付. 从普通村民到社区精英: 中国旅游精英的典型个案——以阳朔“月亮妈妈”为例[J]. 旅游学刊, 2007, 22(7): 87-90.]
- [14] Zhou Chunfa. Rural tourism and elite reproduction: A case study of Hui Village[J].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2013, 13(1): 117-120. [周春发. 乡村旅游与精英再生产: 以徽村调查为中心[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13, 13(1): 117-120.]
- [15] Zhan Lili. Rural elites and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Heilongjiang History*, 2008, (17): 63-65. [展丽丽. 乡村精英与农村社区发展[J]. 黑龙江史志, 2008, (17): 63-65.]
- [16] Xiang Hui, Zhou Weifeng. Rural economic elites and villagers autonomy[J]. *Sociology*, 2001, (12): 8-11. [项辉, 周威锋. 农村经济精英与村民自治[J]. 社会, 2001, (12): 8-11.]
- [17] Zhu Xuan. A research on the forming and acting mechanism of new rural economic elites in rural tourism: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Tiger Leaping George hiking route in Yunnan[J]. *Tourism Tribune*, 2012, 27(6): 73-78. [朱璇. 新乡村经济精英在乡村旅游中的形成和作用机制研究: 以虎跳峡徒步路线为例[J]. 旅游学刊, 2012, 27(6): 73-78.]
- [18] Zhang Li, Chu Yujie, Zhao Zhenbin. Factors in the rise of women tourists elites in western ethnic communities in China [J].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2014, (5): 101-108. [张丽. 褚玉杰. 赵振斌. 西部民族旅游社区女性精英化因素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 2014, (5): 101-108.]
- [19] Zong Xiaolian. The significance of Bourdieu's culture reproduction theory to the research of cultural vicissitudes[J].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2, 24(2): 22-25. [宗晓莲. 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 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24(2): 22-25.]
- [20] Wu Qifu. Ethnic tourism with cultural identity: A case study for Qiang ethnic[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09, 29(1): 132-140. [吴其付. 民族旅游与文化认同: 以羌族为个案[J]. 贵州民族研究, 2009, 29(1): 132-140.]
- [21] Wu Qifu. National community elite growth under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identity: A case study on the Wulong village in Beichuan qiang autonomous county[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3, 23(4): 17-21. [吴其付. 旅游开发下民族社区精英成长与文化认同: 以北川羌族自治县五龙寨为例[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23(4): 17-21.]
- [22] Wang Lin. On the elite governance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rural tourism communities: Discussion about the election in Ping'an Stockade Village, Guangxi Province[J]. *Tourism Tribune*, 2009, 24(5): 67-71. [王林. 乡村旅游社区文化遗产的精英治理: 以广西龙脊梯田平安寨村委会选举为例[J]. 旅游学刊, 2009, 24(5): 67-71.]
- [23] Gong Xiaojie, Xu Shuhua, Cong Xiaofeng. The change of the role and model of rural elite: Taking Shandong province for an example[J]. *Chongqing Social Science*. 2011, (9): 41-46. [龚晓洁, 许淑华, 丛晓峰. 村落精英角色与形态变迁: 山东个案[J]. 重庆社会科学, 2011, (9): 41-46.]
- [24] Brohman J. New directions in tourism for third world developmen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6, 23(1): 48-70.

- [25] Tosun C. Limits to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proce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Tourism Management*, 2000, 21(6): 613-633.
- [26] Walpole M J, Goodwin H J. Local economic impacts of dragon tourism in Indonesia[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0, 27(3): 559-576.
- [27] Wu Qifu. Qiang village tourism elite growth and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Long Xiaoqiong in Taoping Qiang stockade village, Li county[J]. *Tourism Research*, 2013, 5(3): 29-32. [吴其付. 村寨旅游精英成长与民族文化认同——以理县桃坪羌寨龙小琼为个案[J]. 旅游研究, 2013, 5(3): 29-32.]
- [28] Lu Shichen, Hu Yuxia. On the specialized talents and their social influence in villages[J]. *Journal of Shanxi Teacher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3, 30(1): 23-26. [吕世辰, 胡宇霞. 农村精英及其社会影响初探[J]. 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 30(1): 23-26.]
- [29] Skalte O. The CEO gender pay gap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Evidence from Norway[J]. *Tourism Management*, 2007, 28(3): 845-853.
- [30] Lin Qingqing, Ding Shaolia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women in host society: A gender analysis[J].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2009, (3): 75-80. [林清清, 丁绍莲. 旅游发展与东道主女性: 一个性别视角的研究综述[J]. 妇女研究论丛, 2009, (3): 75-80.]
- [31] Xiong Bingchun. Discussion about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Exploration on gender perspectives[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01, (5): 7-33. [熊秉纯. 质性研究方法刍议: 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探索[J]. 社会学研究, 2001, (5): 17-33.]
- [32] Glaser B G, Strauss A L, Strutzel E.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J]. *Nursing Research*, 1968, 17(4): 364.
- [33] Papathanassis A, Knolle F. Exploring the adoption and processing of online holiday reviews: A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2): 215-224.
- [34] Chen Xiangming. The thought and method of grounded theory [J].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xperiment*, 1999, (4): 58-63. [陈向明. 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J]. 教育研究与实验, 1999, (4): 58-63.]
- [35] Lu Weixu.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and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A case of ethnography of sociology[J]. *Thinking*, 2013, 39(2): 16-20. [卢崴翎. 质性研究法与社会科学哲学: 以社会学中的民族志为例[J]. 思想战线, 2013, 39(2): 16-20.]
- [36] Wang Xiling. How do qualitative studies theorize: On ground theory and its revelation for media study[J].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04, 32(3): 76-80. [王锡苓. 质性研究如何建构理论: 扎根理论及其对传播研究的启示[J]. 兰州大
- 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32(3): 76-80.]
- [37] Strauss A, Corbin J.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M]. Xu Zongguo, trans. Taipei: Chuliu Publisher. 1997: 117-135. [Strauss A, Corbin J. 质性研究概论[M]. 徐宗国, 译. 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 1997: 117-135.]
- [38] Dai Guangquan, Liang Chunding. Exploring the dimensions of place attachment to event venue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Case of international horticultural exposition 2011 Xi'an, Chin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32(7): 777-783. [戴光全, 梁春鼎. 基于扎根理论的节事场所依赖维度探索性研究: 以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为例[J]. 地理科学, 2012, 32(7): 777-783.]
- [39] Gilligan C.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M]. Xiao Wei, trans.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1999: 22-65. [吉利根. 不同的声音: 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M]. 肖巍, 译. 北京: 中央编译社出版, 1999: 22-65.]
- [40] Wu Xianhong. *Risk and Response: The Rural Elites Study in New Times*[D]. Jinan: University of Jinan, 2010. [吴限红. 风险与应对: 新时期村落精英研究[D]. 济南: 济南大学, 2010.]
- [41] Kuang Zongren, Yang Ping. The rural elite and the village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4, (1): 45-49. [旷宗仁, 杨萍. 乡村精英与农村发展[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1): 45-49.]
- [42] Gao Dan. The driving role of rural elites i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J]. *Modern Communication*, 2011, (4): 27; 149-155. [高丹. 论农村精英对农业产业化的推动作用[J]. 现代交际, 2011, (4): 27; 149-155.]
- [43] Wu Suxiong, Chen Hongjiang. From elite governance to democratic governance: The analysis of evolvement of the system of the villagers' self-governance[J]. *Jiangsu Social Science*, 2004, (1): 149-155. [吴素雄, 陈洪江. 从精英治理到民主治理: 村民自治制度演进分析[J]. 江苏社会科学, 2004, (1): 149-155.]
- [44] Bartky S L. Foucault, femininity,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patriarchal power[A] // Diamond I, Quinby L. *Feminism and Foucault: Reflections on Resistance*[M].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8: 289.
- [45] Wang Jinling. *Feminist Sociology*[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5: 47. [王金玲. 女性社会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 2005: 47]
- [46] Alvarez B, Miles D. Gender effect on housework 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Spanish two-earner couples[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 2003, 16(2): 227-242.



## The Roles of Women Elites within Communities Engaged in Ethnic Tourism Based on Gender Traits

CHU Yujie, ZHAO Zhenbin, ZHANG Li

*(School of Tourism and Environ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As key playe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ies, and of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m, elites have receiv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within rural sociology. In particular, the roles of community elites constitute an integral aspect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However, major questions relating to women have not been adequately examined in previous elite studies because of women's lack of representation among traditional elites within rural communities. These include the reasons it is so difficult for women to become elites, or why they are always on the periphery of community power structures. However, an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by the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WTO) has revealed that there are about twice the number of women within the tourism industry compared with other industries. This is because tourism offers them better opportunities to become employers and managers. In western China, some women elites have emerged within communities engaged in ethnic tourism, which is flourishing. According to some studies,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ir emergence differ from those associated with the formation of other traditional elites within rural communities. However, few studies within the tourism literature have examined how these women have become elites and their roles within their communities. Thus, an examination of the roles of these women elite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impact on tourism management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s pertinent. Based on our criteria for selecting individuals to interview, and for identifying female elites within tourism, we conducted 33 in-depth interviews in several different communities engaged in ethnic tourism. Our final sample, based on these interviews, consisted of 22 women from eight ethnic tourism villages located in four provinces in western China. We applied grounded theory in examining the roles played by elite women in relation to tourism within their communities. Our main conclusions were as follows. (1) Women elites within communities engaged in ethnic tourism, and elites within general rural communities are all, in fact, authority figures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communities. Thus, their roles as elites entail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2) Because of traditional gender conceptions, despite their enthusiasm regarding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affairs, elite women within tourism are usually non-system elites outside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This means that they do not control political power within their communities. (3) These elite women also play idiosyncratic female roles, for example, as guardians of ethnic "female" art and as caregivers of women and vulnerable individuals such as children, the elderly, and the poor. These roles facilita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communities engaged in ethnic tourism. They clearly indicate that women elites within tourism have, to some extent, countered traditional views, but have not entirely escaped their influence. This study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within communities, providing managers within these communities with guidelines to facilitate women engaged in ethnic community-based tourism.

**Keywords:** women elites; ethnic tourism; grounded theory; elites' roles; community-based tourism

[责任编辑:魏云洁;责任校对:]